

阿Q精神胜利法成因散论

张民权 赵福生

一、不能把作品撇在一边

有人说：“阿Q主义的精髓，是精神胜利法。”^①我们很赞成这个说法，既把阿Q主义和精神胜利法区别开来，也揭示了精神胜利法在阿Q主义中所占的位置。

既然这是两个范畴不等的概念，精神胜利法又在阿Q主义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专门作一探讨，应该是有意义的。

许多评论者在说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都联系了时代背景，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后遭到失败的大清帝国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尤其在中上层统治者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阶层中，精神胜利法十分流行。这并不错。但他们进而得出结论，说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本不会产生精神胜利法，所以产生主要是统治阶级影响的结果。这，却是说不通的。

上述论者大都有一种先验的印象：被压迫群众是质洁无瑕的，精神胜利法却是那样的庸俗卑下，他们自身怎么会产生呢？一定是统治阶级“传染”的。而在鲁迅自己的文章和当时的文献典籍里，确有统治者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自欺自慰的许多记述。于是持此论者更断定这本来是统治阶级的东西，阿Q只是受影响而已！

这些人离开了阿Q生活的具体环境，离开了阿Q周围的种种社会关系，凭着先验的印象，用纯粹理论上推理的方法，这样来说明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是很不科学的。

阿Q，是《阿Q正传》中的奔走在未庄的阿Q。既然如此，谈到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成因，难道能够把作品撇在一边吗？

显然不能。所以，我们以为主要应当通过作品本身来探寻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

我们寻得的结论是与之迥别的：阿Q这样的被压迫群众，其自身也会产生精神胜利法。

二、赵太爷等似乎不行精神胜利法

如果象有些人说的那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在统治阶级的影响下产生的，那么在以阿Q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里，我们会或多或少地见到这种影响的痕迹。但从作品看，赵太爷等未庄统治者似乎不行精神胜利法，因而也很难谈得上他们对阿Q有什么影响。

确有一些人试图说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赵太爷等人的精神状态有联系。他们说，赵太

爷最先因为阿Q说姓赵就打了他的嘴巴,后来因为疑心阿Q是革命党,又怯怯地低声叫:“老Q”,这活现了他的阿Q相。^②

这其实是误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极端麻木的表现,赵太爷却是那么精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屈伸自如,两者相去何其远矣!

要说表现在统治者群里的阿Q相,老舍《正红旗下》写到的定大爷倒差不离。他是个道地的“八旗子弟”。一次,他请一位牧师到家里吃饭,且看他怎样考虑的:“对,叫他进后门!那,头一招,他就输给咱们了!……要讲斗心路儿,红毛鬼子可差多了!”当他家的女眷因想见见洋人的模样要求让牧师走前门时,他应允了,但他是这样想的:这虽然给了洋人一点面子,可是暗中有人拿他当作大马猴似的看着玩,也就得失平衡,安排得当了。

昏愚、蠢笨而又自以为聪明的神态溢于言表。这才是阿Q相!而赵太爷却是一点没有这种“相”的。

我们这样说,并非认定阿Q相只有定大爷这一种表现形式,而是想说明精神胜利法有其质的规定性。它的要义在于自欺。不能把它的内涵随便扩大。只有当人们的精神处于麻木状态,明明欺骗着自己却又意识不到,且在精神上真诚地感到满足,这时候,精神胜利法才成立。

有人还以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投机革命说明他们是阿Q精神上的伙伴。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以为难以说通。

我们倒是这样看的:虽然当时的中上层统治者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阶层弥漫了精神胜利法,但末庄的赵太爷等人却还没有很深地染上这种恶习。至于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是远离统治中心的下层统治者,还未能清楚意识到封建主义这棵大树已被蛀空,他们的统治不久长了这一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经历似乎也暂时不具备使其滋生精神胜利法的条件。

如此说,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是否就与赵太爷等人没有关系呢?不是。倒正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末庄封建阶级的统治造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请读者注意,我们用的是“造成”,它与“影响”是有区别的。至于他们究竟怎样造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后面要论及,这里就不赘述。

三、《阿Q正传》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把阿Q的历史梳理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是鲁迅为我们描绘的阿Q的最早的一幅画像。由此看,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似乎一开始就同精神胜利法有着某种不解之缘。

这是确凿的。阿Q早先的精神胜利法还表现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对大受末庄居民尊敬的赵太爷等人,他独不在精神上表示格外的崇奉,想象自己的儿子以后一定会阔得多,因为头上有几处癞疮疤的缘故,就讳说“癞”和一切近于“癞”的音和字,且不惜与犯讳的人斗殴,等等。

如此种种,无疑都是精神胜利法的表现。但在我们看,当时表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不甚严重的。象“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的赌气话,象头上长了癞疮疤因而有忌讳的心理,在一般正常人那里也能见到。尽管有人举出阿Q还没有成家就想象自己的儿子会

阔得多是十足的自我欺骗。但平心而论，要是阿Q不是在以后遭受了一系列的不幸和打击，那么成家，有个孩子也并非就是痴心妄想，因而他的“想象”——自己的儿子会阔得多，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内的。

自从宇宙带来了缺陷，
人类为了一种想念发狂，
精神上化了一个影象，
那就是你美丽的希望。

（臧克家：《希望》）

用这诗形容阿Q当时的心理，庶几也是可以的。

以上所述，是想说明当时表现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还没有太远地超出正常人的范围；如果仅止于此，他还是比较容易疗救的。但很遗憾，他的这一精神上的病患非但没及时得以治疗，反在险恶的环境里愈益发展。他终于为精神胜利法吞噬了灵魂。

现在来看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怎样恶性发展的，并注意考察其中的原因。

鲁迅在叙述了阿Q经常与犯讳的闲人斗殴以后，写道：阿Q打不过他们，总是吃亏。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改为怒目而视。但未庄的闲人并不放过，继续作弄他。阿Q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你还不配……”。这时候，他开始以耻为荣。视头上的癞疮疤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终而至于打。阿Q在实际上打败了，但心里却不甘休，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这就进一步地走向自欺自慰。

阿Q的“被儿子打了”的微妙心理很快被闲人觉察，此后每逢他们揪住他的黄辫子，就先一着要他说“老子打儿子”“人打畜生”；阿Q说了“打虫豸”，他们还不放过，必得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才罢休。阿Q又失败了。他又想出了新的克服怨敌的妙法：自轻自贱。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自我欺骗变得更为可怕了。

阿Q有回赌赢了许多，但莫名其妙地被人抢了去。他真的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很快又转败为胜：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这是用了更强烈的刺激麻醉自己。

写到这里，鲁迅用了一句双关语：

“他睡着了。”

是的，阿Q睡着了，他在精神上完全睡着了。

至此，阿Q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精神胜利法的泥潭。如果说他早先的精神胜利法还不很自觉，没有太远地超出正常人的范围，因而也比较容易改正的话，那现在却已病入膏肓，成了畸形性格的人，因而也很难治愈的了。

波及未庄的辛亥革命给了阿Q治愈这一病症的一线希望。但因为这一革命的不彻底和妥协，反推着阿Q向大团圆走去。作品最后写到阿Q，其灵魂浸透了精神胜利法的液汁：他的大劫之期到了，但他并不在乎，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杀头的。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阿Q精神胜利法的恶性发展，并不是由于受了什么人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而是一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不断压迫他、折磨摧残他的结果。他的自欺程度是随着这种

压迫、折磨、摧残的加剧而日渐升级的。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没完没了的压迫、折磨、摧残使他在现实世界处处成为一个失败者，他只能一步步地更深地由外在世界遁入内心世界，用越来越甚的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对于阿Q遭受的这种压迫、折磨、摧残的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且不论，但直觉却真切地告诉人们：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恶性发展。

从阿Q精神胜利法的恶性发展，我们不难推测到他早期的精神胜利法是怎样滋发的，可以想见，阿Q的家庭和早先的生活一定也有一段很为悲惨和屈辱的历史，正是它们诱发了他最初的精神胜利法。

所以，我们认为《阿Q正传》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是揭示了的：“影响”说是没有根据的。

四、从更广阔的背景上作些分析

如果说，我们在上面还是较多地从直觉来说明阿Q的整个社会关系，那么现在则要联系阿Q的整个社会关系，从更广阔的背景上作些分析。

有人也许会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得出结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完全是闲人们的恶作剧。

是这样吗？

是，但不全是。

说是，是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愈演愈烈，确与未庄闲人们对他的侮辱和欺凌有直接的极为重要的关系。这是一些小脚色的地痞流氓，游手好闲，寻事取闹，专以损害弱小者为乐事。其貌不扬、地位低下、无钱无势的阿Q自然成了他们任意奚落的最恰当的对象。他们把阿Q当猴子一样耍弄——这，我们已经作过详尽的叙述。唯此，他们要对阿Q的产生精神胜利法负责。

说不全是，是因为未庄的闲人只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他们敢于在阿Q头上拉屎拉尿，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从作品可以看到，以赵太爷为代表的未庄地主阶级一方面规定了阿Q赤贫的地位，使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欺凌他；另一方面使得侮辱、欺凌他的人不受任何法律的处罚和舆论的谴责。阿Q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把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完全归于闲人是不公平的。

说不全是，也因为阿Q不但受到闲人的侮辱、欺凌，也同时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直接迫害。赵太爷因为阿Q说是他的本家，就给了一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他还挨过假洋鬼子的黄漆哭丧棒。这些都还是浮面的，重要的在于他们剥夺了阿Q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各种权利。他的赤贫地位的形成，他的恋爱不成倒使生计成了问题，他的从中兴到末路、几乎被逐出未庄，他投革命党无门，他的莫名其妙地被拘捕、杀戮，不都同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吗？这是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在未庄的代表者，阿Q的悲剧命运，阿Q的滋生精神胜利法，他们是应当担主要责任的。

说不全是，还因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也同未庄一般被压迫群众的愚昧落后有关系。小D虽然也是个又瘦又乏的“穷小子”，但他不惜与阿Q闹龙虎斗；吴妈唯恐有人说她不正经，吵着要上吊。未庄的许多通例、老例更能见出一般群众的不觉悟。但最令人震惊的是阿Q死后未庄的舆论：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动物尚且要在同伴那里寻找慰藉，何况是人！而未庄一般被压迫群众的精神状态却使阿Q就是在他们中间也得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他找不到一吐积愤的见怜者。他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一方半寸的立足之地。于是，更多地求诸于内，由外在世界完全遁迹内心，不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吗？

但未庄群众的不开化决非偶然，也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剥削、压迫的结果。所以阿Q被精神胜利法所苦的账，最终还应同他们结清。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由于封建阶级对阿Q和阿Q式的被压迫群众长期实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这种剥削和压迫既给了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未庄的闲人恣意侮辱和欺凌阿Q的权利——这是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又造成了阿Q毫无生活保障、完全受偶然事件支配的流浪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上精神上都孤立无援的实际生活处境——这是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

封建地主阶级造成的阿Q的上述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处境，是特别容易使其发生精神胜利法等消极的性格特征的。这只要看看恩格斯关于英国早期工人状况的叙述就明白了：

“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困还要厉害得多。……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至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望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望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④

阿Q的情况是与之很类似的。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的产生，也可以这样得到说明。

五、一部分被压迫群众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必然性

阿Q是被压迫群众。被压迫群众自身却产生了庸俗卑下的性格特征，这奇怪吗？

我们认为并不奇怪，却正如春有花艳、冬有寒袭一样的自然。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固然会燃起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斗争火焰，锤锻其意志和毅力，造成无数豪杰斗士，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克斯，我国古代的陈胜、吴广等众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屈服于命运的浑浑噩噩的奴隶，有可能在被压迫者中间造成一些庸俗卑下的性格特征。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牠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⑤

鲁迅又说：“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等优点，“也是中国人性中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⑥

他这是指出了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一部分群众原有的一些优良品性可能萎缩，而一些庸俗卑下的性格特征却可能在他们身上萌发。

那么，作为阿Q性格最主要的特征的精神胜利法是否也如此呢？我们以为是的。

精神胜利法，其实正如有些人指出的，决非只是统治阶级特有的现象，而是许多阶级的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都会发生的，只是在不同阶级的人身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和发生、发展的原因。阿Q作为一个被压迫者，他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除了有同当时的剥削阶级共同的原因——一定的民族传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外，还有他那个阶级特有的原因，即地主阶级对之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奴役和阶级压迫，这使得他们不能不常用忘却痛苦、幻想将来或作其他的令人可笑的自欺方法来摆脱精神上的绝望。

这里，我们不妨引述一下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的产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罗马奴隶制帝国社会面临着各方面的总解体，“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会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⑦这不也有力地说明了被压迫阶级中一部分人产生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必然性吗？

这种必然性，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当然是客观社会环境，但也同人自身的生理条件密切相关。

恩格斯曾说：“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下，工人逐渐变成了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⑧他这是在说明工人犯罪的原因。

阿Q这样的农村流浪劳动者怎能不受自然规律支配呢？

这也就是说，人的生理条件是有一定限度的。当人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虐待以后，其灵魂有可能被玷污，其性格有可能被扭曲，他们会做出正常人和他自己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种种让人耻笑的举动。精神胜利法所以在一部分被压迫群众那里发生，也是有这样的必然性在的。

六、由此论及《阿Q正传》的思想内含

弄清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对于我们更为准确地评价鲁迅这一作品的思想内含是有意义的。

鲁迅曾这样谈到他写作《阿Q正传》的主观思想：“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⑨应当说他的这一意图是充分实现了的。但这一作品实际所达到的，还不只是暴露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性的弱点，且在客观上提出了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这一弱点的社会条件，即封建主义统治的问题。这不能不认为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

我们知道，鲁迅当年曾努力探索“国民性”问题，认为这是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的原因。但他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因而不可能明确指出它在实质上是个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只有把劳动群众从被剥削被奴役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解决。他在那时的一些言论，不是强调改变“国民性”的重要，就是感叹“国民性”改变的艰难。直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说：“最初的革命（指辛亥革命——笔者）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不肯了。”^⑩这说明鲁迅直到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着手写作《阿Q正传》时，他所要“暴露”的“国民的弱点”就变得十分具体了，于是他就写了阿Q这样一个被压迫群众

论鲁迅在厦门的思想转变

林玉山

鲁迅先生在厦门虽然仅 135 天，但在他思想发展中却是重要的阶段。鲁迅先生在厦门思想变化激剧，绝大部分是剧烈的量变，而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部分质变。这些都为到广州实现思想上的完全质变做了充分的准备，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这是大家所一致同意的。但是对于鲁迅思想的转变时期，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开始于‘五四’时期，完成于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论鲁迅前期思想》，152页）有人认为“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屠杀开始，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展开，这又是鲁迅思想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飞跃和质变的时期。”（林非：《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8页）（按：“四·一二”应为“四·一五”为当）。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看法，未免把鲁迅思想转变时期提得太早，而第二种看法，未免又推得太后。而这两种看法的共同特点是忽视了鲁迅在厦门的“休息”“及有些准备”，忽视了鲁迅在厦门思想的重要转变。我们认为，鲁迅在厦门是思想转变的重要时刻，鲁迅从革

的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揭示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成因。这就在客观上把“暴露国民的弱点”与根除产生这一弱点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阿Q正传》的深刻处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要指出的，过去为人忽视的这部作品所包容的思想内含。

注：

- ① 张毕来：《新文学史》第1卷49页（1953年版）。
- ②③ 李希凡：《典型新论质疑》（《弦外集》）。
- ④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00—402页；417页）。
- ⑤ 鲁迅：《坟·灯下漫笔》（单行本，205页）。
- ⑥ 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谈起》（单行本，63页）。
- ⑦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33页）。
- ⑨ 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单行本，119页）。
- ⑩ 鲁迅：《两地书·八》。